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 95 期 (总第 345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10 年 8 月 31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8961988622

编者按：8 月 20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江苏省考察。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改革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完善体制机制，强化科技创新，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李克强副总理在江苏考察时的讲话，再一次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话题上。中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初级阶段，许多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需要时间和坚定的政治决心。虽然中国经济面临着投资占 GDP 比重过高、“刘易斯拐点”逼近和潜在产出增长放缓这三大挑战，但仍然有潜力在未来很多年保持 7%至 9%的高速增长，而城镇化将成为推动因素。本刊特此推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专题，供各位领导决策时参考。深圳改革开放 30 年了，特编发两篇文章以纪念，也祈盼得到您的关注。

要目

●本期专题/转变增长方式

吴敬琏：经济转型三件事

贺铿：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三个五年规划与社会民生 20 年问题求解

外资银行专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变

经济增长动力充足“次萧条”不会出现

●国是论衡/请深圳为全国再杀出一条路来

●政坛经纬/党政事务外包：企业也能干“政事”

●人物档案/1983，总书记胡耀邦在深圳

●本期专题/转变增长方式

吴敬琏：经济转型三件事

转型理论不能成为一个框

不搞懂经济发展的理论，而是像吃快餐一样只抓结论，不讨论理论分析的过程，不讨论历史发展脉络，就不可能明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

保证中国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一点已有很多论述。令人欣喜的是，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苏南地区，最早响应中央要求，开始转型探索。

各个地方的资源禀赋状况不一样，产业发展基础不一样，历史文化背景不一样，转型的基本路径也就不一样，各有特色。现在，转型有三件事迫切需要抓紧做。第一件就是要搞经济转型的理论。

吴敬琏曾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应通过三条路径实现增长模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都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但转型现在从理论变成了政策结论，进而变成一个政治口号；甚至变成一个框架，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到底要转变什么，反倒变得模糊起来。可谓数典忘祖、引喻失义。

有一种说法是，转变要从投资、外需转向内需、消费方面。这当然是对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提法。但这些提法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心环节在哪里？从何下手呢？又不清楚了。

我们曾经两次调整过国民经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原来的提法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十五”计划时仍坚持这个提法。但十五计划实施过程中，政府在资源配置中退出的趋势逆转了，比如开始对国有土地资源的配置，获取了几十万亿的土地转让价差。各级政府用手中的资源去营造高速度的GDP增长。

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的任务完成了，但原本提出的经济建设要转到以效益提高为基础，这个基础、前提却完不成。转型有这样的苏联误区和历史教训。

有人认为转型很难，因为我们消费的比率太低、储蓄率太高。实际上这样的问题西方国家在19世纪时同样遭遇。这是因为投资率太高，资本收入在整个的社会中的比重因此很高，直接影响到了消费率。东亚国家经历的危机即说明这一点。

我们的政府有些举措刺激消费，比如削减农业税、家电下乡、各类补贴。但如果生产结

构没有改变，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将是抑制消费。你想想，政府这样做，钱从哪来？那就加税，而加税的结果实际是抑制消费。

不搞懂经济发展的理论，而是像吃快餐一样只抓结论，不讨论理论分析的过程，不讨论历史发展脉络，就不可能明白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关于转型的规划已不是过去那种规划，不是把政府计划换个名字，而要有新的理论内容。

转型规划的体制障碍

电价、地价，现在还有外汇，这些生产要素价格太低，等于鼓励用粗放型的方法来增加GDP。

第二件事就是要组织好经济增长模式。各地方实际上是在组织了，可现在全国的情况是，转型的招数雷同，结构雷同，相当地普遍。我们每一个地方应该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的状况，根据自己的产业链发展基础，还要研究世界发展的大势，来确定自己增长转型的做法，不同的做法。

比如广东，它的基础是加工制造业企业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那么它的转型实际上是以制造业为重点。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它有条件在某些产业上率先实现转型。

制造业方面，广东有两个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一个是改造，依据的是施振荣的微笑曲线的方法。另一个是根据当前世界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规律，寻求新突破，从中形成一些新的产业链。

而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两大革命：一个是芯片的革命，中央处理器及其他芯片。一个是网络的革命。现在的三网融合，会促成一场整个信息通讯产业的大革命、大调整。

组织经济增长新模式，首先要梳理，看看我们过去在支持产业升级方面，做法上有什么需要取长补短的地方。现在初步转型已经上了轨道，就要考虑更长远的问题，那就是人力资本的投资问题。

那么，接下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政府怎么改善？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工作，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无锡或者苏南其他几个城市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政府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跟市场化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在全国的范围来看，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以往的教训是，每次谈及转变，总是由政府来定规划、定重点，然后政府来组织项目，组织人力、物力，定项目、定目标，然后技术攻关，再由国家的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来进行产业的转化。

其结果是，从一开始，人们制定职业性计划时往往就很难掌握全部信息，政府组织研究、攻关的效率也很差。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科学、技术、发明远远落在外国人后面。但是经过三十年改革开

放，情况已经极大改观，现在的科学和技术人员数量世界第一，研究和开发经费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超过了日本。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发明接近世界前沿水平，但是相关的产业化却是步履维艰，没有发展起来。有一些商品化、产业化了，但被叫做小老头树，老长不大，什么原因？体制。

目前，市场主体面临四大体制性障碍。第一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太大，第二是把 GDP 增长作为政绩好坏的主要考评标准。

第三，我们的财政体制不管是从收入方面还是支出方面，都要求各地政府官员要把 GDP 搞上去，把量搞上去。收入方面，税收的一半是增值税，而且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是跟物资生产部门直接联系的。支出方面，中央责任过度地下放给了地方，一个是义务教育，一个是社会保障。有 70% 以上的支出责任在县级财政，更早时甚至在县以下。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想尽办法增大经济总量，而不要考虑效率。否则，它的日子过不了。

第四点则是资源型生产要素的价格太低，电价、地价，现在还有外汇。这些生产要素价格太低，等于鼓励用粗放型的方法来增加 GDP。

政府仍是转型领导者

关于民营经济的“新 36 条”，有很多的进步，特别是明确了非禁止进入。但目前这还只是个文件规定，实际上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未打破。

现在，全国都在组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政府仍应起到一个领导者的作用。但是，要总结我们历来的经验教训，要改善我们的方法。基本的就是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政府现在就有一个职能普遍没有发挥，就是规划和协调。这个规划不是指制定指标，也不是指制定计划，而是提供综合性、长远期的信息供业界参考。每个企业掌握的信息往往是短期的、局部的，而现在的产业变得分工非常复杂，互相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公共产品和私用品中间有一个中间地带，不同的情况之下这个中间地带可能还会有所变化。在中国的情况下，可能政府做得更多一点。但是，有一些是肯定应该由企业做的，由市场做的；政府越俎代庖，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就无所作为；政府应该有作为，但是政府要做它应该做的事情。

政府应该作为而实际上不作为，缺点也非常明显。比如不能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不能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无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现在，政府在组织经济方面，有四个方面不值得提倡。

第一是指定技术路线。日本政府在信息产业方面的此种教训非常深刻。

第二是设立了过多的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行政许可和变相的行政许可，可谓五花八门，

有的叫审核制，有的叫备案制。投资整个就是个行政许可。市场经济的原则本应是非禁止进入，即没有法律明文禁止的都可自由进入。我们则是管得太多。关于民营经济的“新 36 条”，有很多的进步，特别是明确了非禁止进入。但目前这还只是个文件规定，实际上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未打破。

第三，运用行政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民经济在哪些行业要控制，哪些领域要统治，是有明确规定的，虽然这个规定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范围太大了一点。但有一些自然垄断行业是不是应该由国家控制，这有争论。而现在，国家实际上控制的领域，比十五届四中全会规定的要大得多了。

第四，部门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本部门掌握着某一个基金，或者是某一个方面的准入控制，就把这个给向自己的关联企业或是下属企业，或是本地企业。这相当于政府直接进入了竞争，它要支持一个企业就等于打击别的企业。

转型无止境

现在正在进行教育去行政化的探索，这种探索一定要由政府来做，因为政府不开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

当然地，政府要对一些新产品、一些既有社会效益又有外部效益的产品进行补贴。但这个补贴要尽量用补贴需方的方式。这种方式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发挥消费者主权，通过市场的办法来筛选。

还有一个改造教育体系的问题。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在谈西方国家转型时，都非常强调教育体系在中世纪后期的逐渐形成，以及所谓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化管理。现在正在进行去行政化的探索，这种探索一定要由政府来做，因为政府不开口、不同意，根本做不了。另外，学校内的教育体系应有一些革命性的变革。这方面秉持学校自治理念的南方科技大学值得关注。

革自己的命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有很多人是不愿意革自己的命的。但是，如果由此推论说革自己的命是不可能的，那我们是在放弃改革。

转型是一个无止境的事情，比如说台湾，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 90 年代初期新台币放开以后，转型告一段落。但现在面临的是进一步转型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转型。（口述：吴敬琏 记录整理：南方周末记者舒眉 2010-08-18）

贺铿：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强调。正像我们总书记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在年初的时候所强调的,如果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我们就很难做到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他们提出来这个问题是刻不容缓的。

为什么呢?由于二三十年代,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我们许多的经济结构都受到了破坏,就拿GDP这个构成来讲,我们GDP中最终消费所占的比例已经下降到48.6%了。最终消费降到48.6%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先说两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世界平均的最终消费率是多少,世界平均的最终消费率是65%,我们低了18个百分点。美国的总消费率是70%,我们是低了20多个百分点。消费率这么低,它的实质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生产的财富大部分是用于投资,给劳动者报酬这一部分占比不断地在减少。劳动者占比的减少,最低消费率的降低,它的根本原因就是1998年亚洲金融[2.980.00%]危机之后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大投资。所以从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当中,我们的最终消费率降低了11个百分点。(2010年08月19日中国日报)

三个五年规划与社会民生20年问题求解

“十五”计划明确提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预期目标,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指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我们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十一五”是社会事业和民生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的五年,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民生“五有”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开始逐渐转移到民生领域。据参与“十二五”规划起草的专家透露,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是今后5年中国进一步调整发展的主要思路之一。据悉,“十二五”国家将制定公共服务均等化重大专项,目前国家发改委已开展《“十二五”时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思路研究》。

三个五年规划与社会民生20年问题求解

发展和改善社会民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落脚点,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十五”时期,我国提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新战略,“十一五”时期提出“五有”新目标,

“十二五”时期乃至未来 10 年，我国将进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公众最热切的期待。

“十五”起航：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正式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虽然从“六五”开始国家把社会发展纳入中长期发展战略中来规划，国家计划也正式改名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但社会事业和民生问题受到重视仍经历了一个过程。特别是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国大力推进国企改革，下岗人员大量出现，社会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社会民生问题开始凸显。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十五”计划明确提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预期目标，2002 年 10 月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指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我们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03 年“非典”危机充分暴露出我国经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矛盾。2003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其中之一就是强调要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明确提出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等。

“十五”时期政府对社会民生的关注重点放在了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1998 年至 2003 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 2818 万人。面对庞大的下岗失业人员队伍，中央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做出全面部署，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 2002 年 9 月《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2005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及《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等，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年末。在社保方面，2001 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辽宁省开展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工作，2004 年又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吉林、黑龙江两省。在试点的基础上，2005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随后各地纷纷启动试点。同时，这一期间基本完成了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我国初步形成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

在教育事业方面，2001 年 7 月出台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推出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要求依法不断增加教育经费，到 2005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例达到 4%；全面落实以“奖、贷、助、补、减”为主要内容的资助家庭困难学生的政策与制度。这一时期比较大的突破是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2003 年国务院作出了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新增教

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重大决策。2005 年底，国务院又决定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把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在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方面，针对 2003 年发生的非典疫情，中央提出用 3 年时间建立和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和疾病监测信息系统的目标。到 2005 年底，全国已有 66% 的乡镇卫生院和 93.21% 的县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100% 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现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此前，2002 年 10 月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加快农村卫生事业发展。从 2003 年开始，我国启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截至 2005 年底，全国已有 1.77 亿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参合率达 75.8%。

“十五”期间，政府还没有建立“保障性住房”体系的概念，这一时期这一领域的主要任务仍是继续深化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启动的住房货币化改革。由于过度市场化，这一时期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投机炒作等不良苗头，为此，2003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发展，但此后房价仍开始快速上涨，百姓住房难问题越来越突出，2005 年 3 月 26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就稳定房价提出八条意见（“国八条”）。这个通知可以说是延续至今的房地产市场调控的肇始。

“十一五”破冰：“五有”新目标写进十七大报告

虽然“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正式提上日程，但社会事业发展仍然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就业压力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社会保障压力不断增大，住房难问题开始显现。“十一五”是社会事业和民生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的五年，特别是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和“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都用一个篇幅对包括就业、社保、收入分配、公共卫生等在内的和谐社会建设内容作了详细部署。2007 年 11 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民生“五有”目标提出，意味着党和政府工作重点开始逐渐转移到民生领域。

学有所教，十七大报告将其列为改善民生的第一目标，强调要“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2007 年~2008 年，全国城乡都免除了义务教育的学杂费。从 2008 年开始，中央启动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制定工作。历时两年，今年 7 月召开的新世纪首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纲要》正式公布。

劳有所得，十七大报告就扩大就业首次明确提出，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这意味着鼓励支持创业将被摆到就业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上。2006年11月，劳动保障部发布《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2007年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劳动新法”集中出台；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就业促进法》将促进就业列为政府的基本职责，为劳动者就业提供了法制保障。

病有所医，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建立一个“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的目标。2003年启动的新农合到2008年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2007年7月国家又启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2009年4月，中央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目前医改已全面推开。

老有所养，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007年，我国城镇企业职工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为模式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基本确立。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正式下发，目前为全体农民基本生活“兜底”的保障网已经形成。2008年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启动；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启动，将农村老人逐步纳入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2010年1月，《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正式实施，消除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参保人员跨省转移的制度障碍。

住有所居，是十七大报告针对低收入者住房困难问题提出的一个新任务。继经济适用住房之后，廉租房成为各地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重点。2007年我国安排49亿元用于廉租房建设；2008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宣布3年内将投资9000亿元建设保障性住房。与此同时，各地相继启动了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旧房改造以及“两限房”、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今年以来，中央有关部委相继下发了《关于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中央补助城市棚户区改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加快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十二五”及未来十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攻坚

“十一五”是我国社会事业和民生问题全面推进和取得重大突破的五年。但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还存在不平衡现象。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住房难、住房贵，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滞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城乡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仍在拉大，这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大都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缺失和失

衡有关。因此，“十二五”乃至未来十年，亟须通过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加以解决。

所谓公共服务均等化，其要义在于公共服务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按照“均等化”的原则，无差别、一视同仁地提供给全体社会成员，涉及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住房、治安、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要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强调，“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党的十七大之后，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破题。2008年7月，海南省发布了《关于大力改善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意见》；同年8月，浙江省启动全国首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2008—2012)》；广东省则于2009年12月出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2009—2020年)》。

据参与“十二五”规划起草的专家透露，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是今后5年中国进一步调整发展的主要思路之一。据悉，“十二五”国家将制定公共服务均等化重大专项，目前国家发改委已开展《“十二五”时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思路研究》。国家发改委初步提出六条意见：制定全国和省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强化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权责；以制度统一为切入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适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的财税体制改革；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监管体系建设。专家指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二五”是关键的五。除了国家重大专项外，各地也需要制定专项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明确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间表和相关配套政策体系。据悉，目前广东省已启动了“十二五”规划中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编制工作。(领导决策信息 2010年第33期)

外资银行专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变

尽管国内外对于中国确切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必要的调整看法不一，但人们普遍认同中国应该更多地依靠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记者注意到，近期有关中国经济的争论大多集中在短期增长轨道及政策前景上，对于增长方式是否正在转变则分歧不大，多数观点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与记者连线的外资银行专家表示，中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初级阶段，许多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需要时间和坚定的政治决心。虽然中国经济面临

着投资占 GDP 比重过高、“刘易斯拐点”逼近和潜在产出增长放缓这三大挑战，但仍然有潜力在未来很多年保持 7%至 9%的高速增长，而城镇化将成为推动因素。

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缓慢

从近期国内高层领导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在后危机时代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必要性，找出了关键问题所在并表达了推进相关改革的决心。但是，瑞银集团中国经济研究主管汪涛告诉记者，对全球经济形势的担忧依然存在且改革的推进有一定困难意味着，这种转变的进程会比较缓慢。

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首先，一些短期刺激消费的措施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起到了一定作用，且基本上已延长至明年。不仅如此，今年养老金再度上调，最低工资也有所调整。不过，汪涛认为这些措施的宏观影响相对较小且正在减弱。其次，医保及养老改革正在按去年的方案推进，修建学校及诊所的支出正在增加，且政府已把对农村医疗保险的贡献提高了一倍，同时还扩大了农村养老试点范围。汪涛预计这或将导致今明两年养老和医疗支出规模每年各增加 GDP 的 0.5%。不过，要看到社保体系改善导致居民改变消费行为可能尚待时日。第三，政府正在通过投资建设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并给予这些地区类似部分沿海地区此前所获优惠政策来推动其加快增长。政府还积极推动另一项主要结构性调整，即帮助国内工业通过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虽然这些政策是维持增长所必要的，但汪涛认为这些政策的初步影响可能更多体现在投资而非消费上。第四，2010 年 5 月国务院发布了鼓励民间部门发展及进一步开放服务业的政策指导，并在 7 月底要求各部委研究出台具体措施。汪涛表示，这些政策的潜在影响可能很深远，有助于刺激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是消费持续增长的关键，但需要看到具体措施出台才能评估其影响。

谈到在转变增长方式进程中进展比较缓慢的方面时，汪涛列出了工业电价等要素价格的调整、国有企业向财政上缴分红的试点推广、培育可持续的城镇就业增长等。

未来经济面临三大挑战

野村亚洲（日本除外）首席经济学家苏博文则强调了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三大挑战，称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许会导致经济遭遇重大挫折。这三大挑战包括：

第一，投资占 GDP 比重过高。苏博文说，对于多数经济体而言，投资通常是 GDP 构成中波动性最大的部分，很多原因都可以导致投资骤降。投资过度或者投资质量低下会带来产能过剩、利润和财富缩水、不良贷款增长以及商业信心的下挫。政策失误和没有预见到的冲击也会导致投资骤降。“实际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投资常常会出现负增长，10 年中至少有一年是这样。”他说。

第二，“刘易斯拐点”逼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发现，当经济发展到一定

阶段，农村过剩劳动力供给就会开始减少，从而让产业工人有更大的谈判权来要求增大工资的上调幅度。而工资上涨有利于消费，但可能会挤压利润空间、降低出口竞争力。而且，如果工资上涨转嫁给消费者，还会引发通胀。历史经验表明，当 1965 年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人数超过第一产业时，日本的实际工资才开始大幅上扬。同样的现象发生在 1987 年的韩国。“在中国，目前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仍然超过其他产业。但根据目前趋势来推断，到 2015 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将超过第一产业。不过鉴于中国迅速步入老龄化，‘刘易斯拐点’可能会出现得更早。”苏博文表示。

第三，除非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否则中国未来 5 至 10 年潜在产出可能放缓。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1995 年至 2009 年期间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平均为 9.6%，其中来自资本积累的贡献率高达 5.8 个百分点。但由于人口老化导致就业停止增长，且资本深化带来的贡献率开始企稳，世行预测 2010 年至 2015 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放缓至 8.4%，2016 年至 2020 年进一步放缓至 7.0%。世行的这一预测强调了中国需要更有效利用劳动力和资本（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急迫性。为实现这一点，苏博文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市场的力量。他建议采取以下具体举措：减少对土地、能源和水资源的价格补贴；提高汇率灵活性，让货币政策以信贷价格而不是信贷数量为目标；要求上市国有企业支付更多红利；消除进入国有企业垄断行业的准入壁垒；加快民营化进程。

城镇化推动未来经济增长

根据野村的预测，直至 2012 年中国经济都会继续快速增长，增速约为 10%，CPI 增速保持在 3% 至 4%。其理由是中国仍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虽然日前公布的日本二季度 GDP 数据证实中国经济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人均 GDP（3910 美元）远低于日本的 40927 美元，只相当于日本 1974 年的水平。野村经济学家孙驰据此认为，中国较低的人均 GDP 意味着其仍处在快速发展的增长阶段，在基础设施和私营产业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内陆地区。由于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对耐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也意味着中国正处于消费热潮的初期阶段。汪涛预计，未来中国的实际消费增长可达每年 8% 至 10%，与实际收入的增速一致或略高。孙驰告诉记者，城镇化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在未来 20 年，我们估计约有 3 亿人口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镇。这一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他说，收入差距推动了城镇化。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也将增长，制造业扩张将更具持续性，或将创造对城镇房产的巨大需求。他还预计，未来世界其他地区将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总需求的影响，或者因为中国经济遭遇挫折而导致全球需求不足。（2010 年 8 月 27 日金融时报袁蓉君）

经济增长动力充足 “次萧条” 不会出现

近日，有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经济将面临“次萧条”状况。对此，民生证券宏观经济研究员郝大明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新增长因素非常可观，未来发展动力充足，面临的全球经济环境改善，“次萧条”状况不会出现。

“次萧条”是指宏观经济已经走出衰退，在反弹后再次出现经济的下滑，从而导致经济出现振荡、波动、分化的底部运行特征，但下滑幅度还不足以构成“二次探底”的标准。

从近期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指标都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调整模式。8月1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了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1.2%，连续第3个月下降，这预示经济增长动力趋弱。加上当前投资与出口增长基础还不够稳固的情况，不少人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开始“下行”，未来逐季下降的幅度很可能超出一般市场主体的预期。

分析人士认为，实际上，PMI指数的回落是我国经济主动调整的结果，这个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经济正在朝着既定的调控方向平稳运行。

民生证券宏观经济研究员郝大明表示，虽然今年GDP增速逐季下降，但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前景很好，城市化和消费率提高是未来10年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GDP增长率慢不下来。就房地产来说，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会非常好，上半年38%，下半年再悲观也不会低于31%，预计全年投资增速能达到35%

据郝大明分析，2010年全年，翘尾因素下行迅猛，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1.9%，其中翘尾因素为9.3%；二季度GDP增长10.3%，其中翘尾因素为6.9%；三季度翘尾因素为2.5%，比二季度低4.4个百分点，而预计三季度GDP增长9.1%左右，同比数据下降缓慢，由此可见，经济新增长因素非常可观。

不仅如此，一方面我国在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另一方面又相继推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西部大开发方面的投资，新一轮投资目前已经成型。下半年新一轮投资对总投资增速的支持增强，将部分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而且，未来两年国家在新兴产业，新能源，节能减排、等方面加大力度，经济发展动力充足。

从出口方面来看，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形势已逐渐好转，今年再现出口负增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形式好于预期，中国面临的经济环境改善。郝大明表示。

进入2010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在逐步降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国家经济形势好于预期，刚进入8月，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迎来新一轮的议息高潮。特别是市场

此前担心全球经济将出现“二次探底”风险的概率已经逐步降低。

美国方面，尽管近期公布的部分宏观经济数据出现一定程度走软，但业内人士认为，这表明美国经济已完成由“再库存化”推动的经济强劲反弹，逐步回归经济增长的正常化阶段，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可能达到 3%。这一经济增速相当强劲，也消除了市场对美国经济有可能陷入“滞涨”的担忧。（2010 年 08 月 05 日 08:26 来源：证券日报 夏青）

●国是论衡

请深圳为全国再杀出一条路来

8 月 26 日，深圳特区三十岁。三十年间，最初只有“一条街道，一个红绿灯，一个警察，一个公园”的小镇，在经济发展方面，已大致可与香港平等对话。这座城市，以及它的缔造者们，创造了奇迹。

这个奇迹背后，是无数领中国风气之先的创举，是一个个像袁庚、梁湘那样敢把身家性命押上、从禁区与混沌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人，他们用好了毗邻香港这一地理优势，也用足了“特殊政策”，给事涉 13 亿人的市场化转轨，在诸多关节点上提供了第一手的示范，以及经验与教训。

现在的深圳特区，有两个定位。对工作生活于此的千万人来说，深圳要回归城市本位，为她的民众，谋得一个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前景。由此，深圳要考虑城市公共安全与城市管理体系的扁平化，考虑“支柱产业”，考虑充分利用创业板，将创新之根扎得更深……在这个定位上，深圳要发展，也要平稳。

另一个定位是综合改革示范区。一旦将深圳重新放回中国转型的大视野，这枚改革开放下的蛋，就还有更重大的使命：她要为尚在艰难转轨的中国，示范一条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之路。这些路，或许更有风险，更有争议，更需要政治家的远见、智慧，以及勇气。在这个定位上，深圳继续成为改革的探路者，要敢于试验、跳跃乃至“冒险”。

放眼全国，从上海浦东新区到深圳特区，我们已经有了 8 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这些试点区，在各自侧重点上，都担负着为全方位改革探路的使命。然而，唯有深圳得天独厚，与香港仅一河之隔，那里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又以法治与自由著称于世。学习香港如何管理一座巨大的城市，如何践行法治、保障公民的各种自由，深圳最为便当。

深港同城化，交通等硬件只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具体行政、商业、法制操作上的对接。再一个层次，则是贯穿于各种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基本文化与精神的水乳交融。说到底，无非是市场自由，法治完善，政治民主，社会宽容与文化多元。相比于已经拆掉的二线关，打通深港之间的软硬关口，或许更为重要。

“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家宝 8 月 20 日晚在深圳的这些重要提醒，已将最近几年改革攻坚战的艰难处境说得很透彻。

其实，深圳对此已有切身之痛。8 月 16 日，被双规一年多的前市长许宗衡，被查出“收受巨额贿赂”、“生活腐化”后，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这巨额贿赂，便是“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所形成的权力租金。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权力租金蔓延成风，必然要严重威胁深圳的市场经济秩序，以及民众的切身利益，也会给执政党造成负面影响。

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全方位改革势所必然。深圳必须探寻出路。譬如，深圳可借鉴香港设立廉政公署的反贪思路，学习香港详尽透明的公共财政体系，让市民、人大代表与媒体制度性地参与和监督。管住政府花钱的手脚，也就管住了贪腐的最大空间之一。

其实，困局的部分破解之道并不难找。且不说广东早有全国领先的“人大现象”，只待深圳再往前探索几步，在袁庚开拓蛇口工业园区时，也已经有过这样的实践：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年底信任票不过 50%就直接下台。袁庚还规定当地的报纸只要不违背法律，什么都可以报，对一把手也可以点名批评。当时蛇口并没有大乱，反而发展很好，一时称为“改革试管”。

这岂非就是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深圳当回望历史，再看香港，继续当好中国转型的试管。一旦深圳结合内地的制度框架，创造出完善现代治理、落实民权、限制公权的具体设计，则功莫大焉。（作者：戴志勇 8 月 26 日南方周末）

人民论坛：暴富时代下的群体症候与隐忧

当我们真的富裕了，却在财富面前彻底迷失了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实现了社会跨越式发展。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接连超越意、英、法、德、日等老牌经济强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国际某些金融机构更是作出大胆预测：中国有望在 2025 年左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

畸形暴富背后，什么丢失了

中国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积聚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才能创造的财富，这种财富递增的速度让世人为之震惊。然而，从企业到政府、从学者到官员、从草根到明星，国人物欲催生下的数字奇迹与财富狂欢带给我们的却是种种意想不到的群体病症和隐忧。

企业暴富，假冒伪劣产品多了，资源性开发更无节制了，环境污染愈发厉害了，资本市场更加混乱了。一个三聚氰氨，中国整个乳业差点全军覆没;整顿小煤窑，财大气粗的煤老板一夜间“死掉”大半;规范资本市场化运作机制，一大批上市公司纷纷倒掉;推行节能环保，又一批企业被淘汰出局;3.15 打假晚会，不计其数的假冒伪劣产品被公之于众。企业是富了，但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叫得响的国际知名品牌又在哪里？

政府暴富，GDP 指标更加看重了，土地开发动作更大了，招商引资更加突出了，贪污腐败的案件也日益增多了。一切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成为地方政府的规划重点;土地财政的驱使，拆迁改造不断，“地王”推陈出新，一个胜出一个;招商的门类繁多，公款接待、公费考察、公务用车的“三公”性公共支出越来越大;豪华的县政府大楼越盖越多，堪比“白宫”的乡镇奢华建筑群随处可见。政府是富了，政绩工程花样更多了，可作为政府精神的正义与公平却日渐迷失了。

学者暴富，论文产出越来越多了，出书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花样繁多的课题越来越多了，抄袭剽窃的教授也比比皆是了。专业代写、代发论文的机构随处可见，以导师为第一作者发文的现象见怪不怪;几个月就能编撰出一套丛书，出书的人多了，学术的价值越来越少了;一个课题没完，又接着申报新课题了，一年多半的时间都是在写申请书、论证书、跑项目;“抄袭门”“剽窃门”门门相扣，原创的学术作品少之甚少。学者是富了，但作为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推进社会不断进步的神圣职责却丢失了。官员暴富，豪华别墅群越来越多了，开的小车越来越高档了，抽的香烟更加高级了，带的手表更显名贵了，涉案金额越来越高了。被网友曝光的“史上最牛官员别墅群”、“公务员别墅群”一个接一个，自批自建别墅群的现象不断;公务用车年年都在改革，但有些官员的小车级别反而更高了;抽“九五之尊”等名贵香烟的官员随处可见;带知名品牌手表动辄几千上万的越来越多;贪污腐化、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花样层出不穷，涉案金额不断攀升。一些官员是富了，但作为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使命又在哪里？

草根暴富，不务正业、买彩票的人越来越多了，渴望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功利性想法多了，占法律空子、打擦边球的人多了。彩民们围着彩票点转，渴望一出手就能芝麻开门，中个头奖;网络幕后专业推手多了，个人炒作的噱头要多离奇就多离奇，只要能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为了金钱，铤而走险的人多了，制假、造假、贩假成风，社会诚信彻底迷失。草根是

富了，但作为人性最为本质的价值追求、最为本性的生活呈现又在哪里？

明星暴富，商业化路线更加清晰了，“问题代言”越来越多了，拍的影视作品越发庸俗了，个人修养和觉悟更加低下了。星腕们越来越大牌，公益性的节目漫天开口要价，狮子大开口；昧着良心代言，问题奶粉、假冒伪劣的药品、洗发水等堂而皇之地公开代言，只要给出场费，啥都敢代；经典的传统作品一次次被糟践翻拍，只要有噱头，有收视率，要怎么低俗就怎么低俗；忙于走穴、代言、搞演唱会、出专辑，个人的修养和文化水平每况愈下。明星是富了，娱乐精神也更加疯狂了，但作为公众社会形象却荡然无存了。

财富面前的精神迷失

渴求财富本身并没有错，我们搞改革、调结构、发展生产力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让国人脱贫致富。然而，当我们真的富裕了，却在财富面前彻底迷失了。财富就像一个神秘的无底洞，牢牢地把我们吸附着，让我们一次次心生物欲，去创造所谓的财富神话，而内心中的价值观、生命信仰、精神财富却日益干瘪，日渐被吞噬。

随着经济效益的驱动、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以及利益关系的变动，刺激和引爆的是国人强烈的财富欲望。与此同时，拜金主义、贪污腐化等极端的功利欲也日渐瓦解了国民传统的道德信仰体系，导致国民道德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沉沦、消逝。这样，企业不讲诚信、见利忘义；官员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学者剽窃成风、人文精神丧失殆尽；医生不再救死扶伤、医德医风滑坡。在今天的财富面前，传统的道德、良知、正义、责任变得如此不堪一击，金钱、财富却成为价值判断的标准。随着义利关系的失衡，功利和浮躁甚嚣尘上，在当今时代下得到了最为全面的释放和呈现。

暴富时代下，我们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很郁闷”。那么，为何会郁闷不高兴呢？相对于几十年前，我们今天的时代物质丰裕、资讯发达、交通便捷，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和快乐才对。相反，快乐在这个时代却成为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国家的崛起，应首先是心灵的崛起

其实，古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在数千年前的《沉思录》中就早已劝诫：“你看到一个人只要把握多么少的东西就能过一种宁静的生活，就会像神的存在一样。”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一个浮躁不安的社会，如果观念清明、分配合理，即便没有很多的财富，其社会成员也能过一种幸福的生活。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姚国华教授曾在一篇《一个民族需要关注天空的人》的文章中提到现代日本民族灵魂人物福泽谕吉的一段话：“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明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

不通的。”

改革 30 多年来，我们似乎走入了一种精神误区，以为外资进来了、先进的技术引进了、先进的管理学会了，我们的市场经济就能不断壮大起来，相反，文化作为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却被淡忘了。德国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每一次文化上的飞跃都会燃起新的火焰来，都会出现一种文化复兴的状态。而对于今天大变革时代下的中国，要实现民族的真正复兴，就必须找寻到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并与时代有机结合起来，融合贯通，形成民族国家特有的信仰体系和精神价值理念，这才是民族崛起的关键。

毋庸讳言，国家的崛起，应首先是心灵的崛起，而心灵的崛起和强大，则需要文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因此，在今天的暴富时代，我们应该从民族的文化经典中吸取养分，学会对欲望的节制、对灵魂的净化、对正义的诉求，我们应让传统文化经典中的人文价值和精神理性的回归，让内心真正变得强大，让心灵真正的崛起。即便当物质极其丰盛，我们也应理性的审视自己的灵魂，要在内心深处给最初的理想、道德、信仰永远备留空间，学会在财富面前修己克己，让物质财富成为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从而不断造就辉煌的现代文明。

当前看来，暴富时代，我们更需“仰望星空”，我们应怀载理想，坚定信念，让财富面前的沉思和星空下的仰望成为中国真正崛起的动力和希望所在。(作者：倪明胜；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来源：人民论坛 2010-08-23)

●政坛经纬

党政事务外包：企业也能干“政事”

在无锡，恰恰最不像“外包”的党群指导员制度，引发最大的争议，而“外包”这个词，暂时也变成了当地的“敏感词”。

西安一个区政府将社会经济十年发展规划整体外包——在过去这往往是地方发改委的活。

党务也能外包？

“很难解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西津说。在她的研究领域中，“外包”作为一个特定的词，主要指的就是政府的公共服务，实质是对公共资源使用的新模式的探讨。“党务至少不属于公共服务。”

上世纪 90 年代末，“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制度被引入中国，由于其既切合中国提高政府效能需要，又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外包”很快得到效仿和推广；不过，当它被引入党务部门，却从热词变成了敏感词。

4 个月前，苏南城市无锡的党报称，在无锡新区，从党建研究、形象宣传到文体活动，甚至基层党组织组建，都不同程度外包给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不过现在，官员们对此保持沉默。

“省里觉得‘外包’这个词不太妥当。”无锡新区管委会一位官员强调，准确的叫法是“党建事务外包”。

而同样地处江苏的南京市鼓楼区，现在则不断把各种政府事务列入“外包”行列，自 2003 年起，他们陆续把养老服务、街道打扫和菜市场门口管理交给了企业。

这种现象看起来并不新鲜，也不敏感。不过，按照鼓楼区 5 月专门出台的文件，该区还将规划编制、统计、论证、咨询、课题调查研究等事项，都列入外包范围。

另外一些事情则更隐秘些，国内知名咨询企业零点集团董事长袁岳透露，在过去的多年中，其与中央和地方党务部门均有过合作，只是“不太说”。他曾为纪委征询过公众对腐败问题的看法，还协助某市党委调查当地党员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真实了解情况。

“多数客户要求保密，”袁岳说，“我们跟北京市政府几乎所有部门都有过合作。”

自去年起，各地政府已经掀起了一个外包十二五规划部分课题的风潮。而袁岳最为看重的，则是他们正在为西安一个区政府所做的社会经济十年发展规划——这样一个涉及政府核心决策的政府规划，是由一家企业来操作，其标志意义自然不容小觑。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从最初的产品到公共服务，再到政府管理和决策职能，“外包”越来越接近政府权力中心。而基于中国特殊国情，党务外包又给官员和学者们出了道新题。

不必敏感的敏感了

事实上，无锡的党务外包改革和中国其它改革的逻辑并无二致，都是为了解决实际困难。

2007 年底，无锡新区管委会迎来巨大挑战——当年江苏省启动非公企业党组织工作组建工作，这个人口 60 多万、企业云集的区域压力剧增。无锡新区管委会组织部仅 11 人，却挂了 12 块牌子。

14 名“党群指导员”被招募进来，他们每两人分成一组，负责在划定的区域内进行企业工会和党组织的组建。此后，外包还扩展至其他党群事务。比如，他们在江南大学设研究中心，负责党建课题研究；委托广告设计公司设计党建品牌形象标志；委托央视制作宣传 MTV；将一些文体活动交由专业公司或协会运作。

无锡新区官员对党建事务外包小心翼翼，极力强调作为发包方的党组织没有失去控制权。新区组织部部长刘明邦接受江苏《党的生活》杂志采访时表示，核心而保密的业务不能外包，反之则可以外包，有些核心又非保密的业务可以半包。

他举例说，民主测评、干部考察、班子调整不能外包，有些干部工作可以半包，比如干部监督。而党群组织的组建属于核心业务，采取半包方式，“组建的关键环节，我们是抓在手上的，比如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的确定，指导员顶多有个建议权。”

据此前媒体公开报道，党群指导员每月工资 1000 元，并根据建立党群组织的数目发放奖金。他们一年须完成建立 12 个党群组织的任务，否则基本工资打折。

不过，在位于无锡新区行政审批中心 5 楼的“党群指导员办公室”，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自首批指导员之后，后续递补进入的指导员没有再签订合同。而他们亦没有意识到自己“承包方”的身份——他们认为自己像组织部的编外聘用人员，每天打卡上下班，有时也抱怨待遇太低。

然而，恰恰最不像“外包”的党群指导员制度，引发最大的争议——《党的生活》杂志专门刊载当地十多位党务干部以及专家文章，赞成者与反对者观点激烈交锋。

在经过了一轮宣传之后，遭受争议的当地官员选择了沉默。无锡市委组织部和无锡新区管委会组织部都拒绝接受采访。新区组织部副部长冯惠兴说，目前的做法尚有不成熟之处，暂时不宜再公开宣传。本报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新区计划与江苏省党建会合作专门组织一次研讨会。

按照此前的规划，无锡新区组织部还打算成立“党群服务中心”，注册为非营利企业，既当发包方，也当接包方。不过，《党的生活》杂志点评道：谁来当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组织部门权力介入到什么程度？街道、企业会不会想，这个公司是组织部办的，不给它包行吗？

实用主义推动的外包潮

如果跳出严格的制度概念，对于地方官员而言，无论党务或是政务，“外包”的动机很相似——通过社会化、市场化手段，既省钱省力，又提高效率。而政务外包，更是谨慎而又实用主义。

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最近的一个计划被区政府否决。该局原本打算设立一个事业单位，专司学校后勤工作，但到区长办公会上，被要求改向社会直接购买服务。“想法是好的，路子不对。”区政府一位官员说，“又养了一拨人，事情也不一定能够办得好。”

更重要的是，该区已明确政府公共服务能外包的要外包——今年5月，鼓楼区政府专门成立“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推进工作领导小组，下属部门一把手都自动成为小组成员，这也意味着所有部门都成为改革对象，“有限政府无限服务”理念被反复强调。

不过，最初各部门自发的改革，还没有这样的“觉悟”，“主要是为了解决各自体制上的问题。”

2003年，鼓楼区将养老服务外包，是因为政府的养老支出远跟不上老龄化的迅猛趋势，更直接的困境是，市中心已无空间可建养老院。而外包的结果是：每年政府仅需花20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房租，就能解决2000名老人的养老问题。

源自西方的公共服务外包制度，其核心是通过契约的方式，明确政府与供应方之间的责任关系。鼓楼区环卫所书记李红玲坦言，以前他们是“自己扫自己考核”，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现在将机扫业务外包之后，市容部门有了准确的定位，“他们扫，我们跟在后面”。

从养老到机扫街道，实用主义的探索最终形成决策层的共识。“现在，要完全做到‘能交出去的都交出去’还有一个过程，但是这种意识已经非常明确。”鼓楼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张国强说。

南京市鼓楼区并非第一个建立公共服务外包机制的地方政府，早在2005年，江苏省无锡市在全国率先出台指导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性地方性政策。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无锡的官员会将“外包”概念引入党建事务中。

本报记者注意到，2008年至今，建立相关机制的地方政府开始涌现。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2008年，上海浦东区政府、深圳宝安区政府出台购买公共服务政策或方案；2009年，加入此行列的有浙江省嘉兴市政府；2010年，四川成都、深圳福田区、湖南长沙市，也相继加入。

代替发改委干活的企业

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社会组织是公共服务的重要承担者，另一重要对象是企业。

比如在较早探索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深圳，近几年来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环节，基本上都由一家叫“公众力”的商务咨询公司承担。而零点集团网站显示，它的重要政府客户有三十多个。

目前零点集团的最大客户群仍以企业为主，而官方客户增多趋势，是近五六年以来的现象。

担任零点集团研究总监的吴垠说，过去的许多案例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政务外包，“只能叫外外包或者外外外包。”这些项目往往不是直接来自政府，而是受政府委托的科研机构或者事业单位。

南方周末记者观察到，去年以来兴起一股“十二五”规划“外包热”：青岛、厦门、沈阳等城市先后将一些前期研究课题“挂牌”招标，而今年 1 月，国家发改委宣布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数百个课题面向全球招标。但更本质的突破来自不为人注意的基层政府——去年 9 月，西安市灞桥区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2010-2020）向全国公开招标。总部设在北京的零点集团作为唯一一家企业，从 7 个竞标单位中胜出。尽管发包方仅是区县级政府，但袁岳仍感到有突破——这是一个整体任务，而不再是一个课题而已，而且该区“十二五规划的草本也是我们来做”。

零点集团一个十来人的团队自去年就入驻灞桥，展开调研和起草工作。这个项目的突破意义在于，它已涉及到政府核心决策层面，而关乎一个地区发展的政府规划，由一家企业来操作，在中国可谓罕见——这项工作，一般由发改委主导完成。

事实上，与以往相较，各地出现的十二五规划课题招标已是很大的突破。

厦门市发改委综合规划处官员陈亚军表示，外包的原因，一方面是自身没有足够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自己研究的一个缺陷在于不是很客观。“我们这一群人每天都看一样的文件，听一样的东西，想法会比较容易趋同。而找外面的单位来做就比较容易从外人的角度客观地观察。”

政府的政务行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与挑战。去年，山东省青岛市率先将“十二五”规划的 41 个重大课题向全国招标，该市发改委官员阐述的第一条理由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内经济走势尚不明确”。

事实上，考核和调研是当前外包的主要项目。零点集团的一项传统项目是满意度调查。持续至今的一个长期项目是 2002 年为上海市公安局所作的“公众安全感暨公安工作满意度”调查。上海市公安局在招标公告中称，调查结果主要用于各地区社会治安评估和各分（县）局年度目标管理考核，而非官方性质的零点公司以独立的第三方开展工作。

袁岳说，从官员的角度，满意度调查“有点类似于考试”，希望“用考试证明自己做得还不错”。当然，满意率不可能都如官员所愿，也可能促使一些政策作出调整或修正。

外包服务开始往“脑袋”部分延伸。今年 4 月，北京市交通委宣布，奥运期间执行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再延续两年，同时公布其委托零点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90.4%的被调查者支持延续限行措施，而相反的是，新浪网所作的调查显示 82.9%的受调查者持反对态度。吴垠说，除了舆论质疑之外，有些人还打电话到公司，责骂零点替政府当枪手。

零点公司为此专门向媒体解释，阐述其抽样调查与网络调查的区别。袁岳说，北京市交通委实际上请了三家机构各自独立调查，调查结果都比较接近。“特别是私车司机比较接受现状。”

什么可外包，什么不可以

在专家看来，外包显然应有界线。比如，“审批权、执法权肯定是不可让渡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西津说。

南京市鼓楼区在关于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实施意见中明确，“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收费、行政强制执行”等不得实行服务外包。

在地方的探索案例中，最具争议的是深圳宝安西乡“花园街区”所推行的“综合执法管理模式”，其外包的物业公司“城市保姆”负责 8 大类 26 项社会公共服务内容，涉及街区治安巡查、协助公安机关治安防控、协助交通部门维护交通秩序、协助交通部门维护交通秩序等内容。

当地相关官员和企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执法权仍在政府手中”，比如，面对“走鬼”（小摊贩），巡查员一般采取劝阻方式，实在不行采取人海战术围之。

“我不太相信在实际工作中，这条线真能被守住。”贾西津说。北京市的交通协管员就曾因协助“贴条”和照相而备受诟病，最后被取消这些权限。

从操作角度而言，政府的多数具体事务性工作是可以外包的，比如，不仅发改委，党政机关各个部门的大量研究课题是可以向社会购买的。可以讨论的议题还包括，如果相关事务外包出去，那么，这些部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比如，机关事务管理机构是否非设不可？

事实上，就连政绩考核方案，也可外包。2005 年，从东风汽车老总调任武汉市委书记的苗圩（现任工信部副部长）认为现有考核体系不适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于是委托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为该市重新打造一套考核体系。当然，政府对麦肯锡方案作了修正后才推行。

从袁岳的经验来看，一些外包项目对于政府来说并不是非做不可，之所以做，经常与“开明的领导”有关——他们或接受过海外教育，对外包有更深入的理解，或希望在前任的基础上能有创新。另外的现实是，上述创新也能令官员脱颖而出，得到关注。（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苏永通 周楚 2010 年 08 月 26 日）

●人物档案

1983，总书记胡耀邦在深圳

在党的十二大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于 2 月 7 日至 9 日，来到初创中的深圳经济特区视察。笔者当年是跟随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有幸目睹视察活动的情景，亲耳聆听胡耀邦的精彩谈话。他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方针政策最忠实、最热诚的参与者和执行者，承受着来

自党内高层不同意见的巨大压力，以坚定的意志和毅力排除万难，解决特区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胡耀邦在视察参观和听取汇报后，高兴地勉励道：特区是新事物，要勇于创新，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临离开深圳时，他还专门写下“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题词，旗帜鲜明地表达他对特区事业的全力支持。这一幕至今仍深印在老一辈特区建设者的记忆中。

遗憾的是，笔者当时得到的指示却是不作公开报道，只让把胡耀邦在深圳的谈话整理成内参发北京新华社总社，对此我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困惑和遗憾。现在，适逢深圳特区成立 30 周年，笔者深感有责任弥补这个遗憾。

南来深圳之前北京的一场争论

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中国政坛，正处于新旧交替、政见纷争、党内认识不统一的特殊时期。处于最高领导位置的胡耀邦，面对的是法制不健全和人治社会形成的强大习惯势力，高层某些人士的掣肘和频繁干预，使他常常成为被批评、责难的主要目标。

1983 年 1 月 20 日，胡耀邦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长篇讲话。这是他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首次对国内重要问题发表讲话。这个讲话全面阐述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深远意义，急切呼吁“要敢于革除陈旧的、妨碍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子、老作风，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缺乏活力是最大的弊端，提出要全面系统地、坚决而有序地进行各个领域的深入改革。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胡耀邦这个讲话。几天后，在北京召开的另一个重要会议上，一位长期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高层，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讲话，强调当前全国工作的中心是调整，改革必须服从调整。讲话毫不客气地批评说，有的人的讲话违反了党的十二大决议，十二大制订的第 5 个五年计划期间要贯彻的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只强调改革是错误的。

这两个讲话代表了两种不同意见，究竟哪个是中心，谁服从谁，一时争论不休。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

胡耀邦南来深圳之前，北京的政治气候，正如残冬将尽、初春伊始，乍暖还寒。在来势不小的批评面前，胡耀邦决定用事实来回答，毅然带领中央几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走出北京南下，到被说成自由化泛滥、精神污染严重、搞资本主义的深圳特区实地考察。

一直受到非议批评的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对胡耀邦一行的到来喜出望外。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在巨大的压力下感同身受，两人当即表示要陪总书记一齐前往。2 月 7 日，胡耀邦一行抵达深圳。刚到住地，胡耀邦就催促着要出去走一走，坚持先参观后听汇报。

当天，胡耀邦被安排参观了罗湖商业区、上步工业区、渔民村、小梅沙等地方。正在大规模建设中的深圳，到处呈现出沸腾兴旺的景象，短短三年间，改革开放政策迅速收到了成效，使这个穷困落后的边陲小镇焕发出无限生机。胡耀邦看到的深圳，不仅五星红旗还在，而且这里由多种合作形式构成的全新的特区经济充满活力，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旧模式，社会主义的内涵在深圳被大大充实丰富了。

胡耀邦所到之处，接触过的干部职工异口同声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要求加快特区建设步伐，并不担心资本主义复辟。经过一天的参观，胡耀邦心头的喜悦兴奋之情，彻底驱散了原先在北京压抑已久的焦虑。

当晚，胡耀邦安心地休息了一夜。2月8日早晨，他在住地的院子里散步——平时他难得有这样的空闲放松神经。深圳的初春，阳光温柔，空气清新，庭院中草木嫩绿，花香四溢，环境幽静优美。工作人员看到他背着双手一圈一圈地走着，不时地停下脚步凝视沉思。

从穿西装说到观念变革

2月8日是安排听取深圳市委领导的工作汇报。上午9时30分，胡耀邦精力充沛、神情轻松地快步走进会场。他同任仲夷、刘田夫、林若、吴南生以及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梁湘、周鼎等一一握手之后，用专注的目光朝会场环视着，看到与会干部几乎全都穿着深色卡叽布做的四口袋干部装，突然问道：“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怎么还没有一点变化？我赞成你们穿西装，因为你们经常要出场，要同外商打交道，人家的第一观感就是穿着服饰，老是过去的老样子，人家就觉得你这里还很落后，没有什么变化；来你们这里投资担风险，不放心。”他转过身对市领导们说，你们深圳要转变观念，可以自己先特起来，让干部和工作人员穿得好一点。

待大家都坐下来后，任仲夷笑着说：耀邦同志你先带个头穿西装，我们才没有顾虑，胆子才会壮起来。胡耀邦快人快语：我这个身材穿西装可能不大好看啊。笑声中有人接话说，西装这种服装老少咸宜，什么身材穿西装都显得有精神有气派。胡耀邦听后立即说，下次来深圳一定穿西装。一席事前谁都不曾预料到的、看似即兴却蕴含革新意味的话题，使会场一开始就洋溢着轻松活泼的气氛。大家体会到总书记提出转变观念的要求意义深远。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讲究衣着打扮曾被当成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一荒谬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胡耀邦当年在深圳首先提倡穿西装，实际上也是一项“拨乱反正”的工程。在他心目中，服装是一种文化，讲究衣着打扮是一种文明行为。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胡耀邦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就曾提倡女青年穿花裙子，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列为他的罪状之一。

肯定、鼓励、减压，强调“新事新办、特事特办”

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市委书记梁湘向胡耀邦汇报深圳特区几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详细介绍了特区的建设规模和中期发展目标。他说，到 20 世纪末，深圳特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要达到 100 多亿人民币。记忆力过人的胡耀邦听后高兴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相当于现在的广州，超过现在的重庆市，1982 年重庆只有 67 个亿。他问道：香港现在的产值是多少？陪同视察的国家计委一位同志回答说：香港的统计方法和我们不一样，香港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净产值是 1400 亿港元，折合 243 亿多美元，1981 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折算成美元约为 2800 多亿，香港相当于内地 1 / 10 不到。梁湘还具体汇报了三年来深圳特区经济增长的数字：1982 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3.6 亿元，比办特区前的 1979 年增长 5 倍，农业总产值 1.35 亿元，增长 17.6%；地方财政收入 1.63 亿元，增长 3.6 倍，三年间安排了 3 万多人就业。胡耀邦听后问道：你们有没有向中央报告你们的成绩？任仲夷连忙回答说：我们迟缓了一些，因为我们还有压力、有顾虑，想等到情况缓和一些，上下认识比较统一后，再向中央系统报告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情况。胡耀邦勉励说：你们不要有什么压力，我看搞得不错嘛，应该说深圳特区很有成绩，已经闯出了一个新局面。我给你们总的评价是：比较出色地贯彻了中央办特区的意图。现在你们不应该有什么压力了，有那么大的成绩，你们应当身心愉快，大胆工作，勇于创新。任仲夷插话说，我们只要求两句话：成绩是主要的，特区还要继续办。胡耀邦接着说，和 1979 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你们这里丢荒了 10 多万亩农田，大批人外流跑了去香港，现在情况改变了，人口外流制止了，特区建设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新局面。深圳的同志们是努力工作的，为特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特区是新事物，要允许探索，以后还要继续摸索，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遇到的许多事情都是新问题。胡耀邦强调，中央要求你们要创新，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不要搞成和全国一样的模式，就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不要把内地陈旧落后的东西照搬进来。（刘田夫插话说：我们的手脚现在还被束缚着呐。）你们要敢于创新，有些事情是中央有关部门的责任，有些事情是你们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缚起来的。胡耀邦说，我看的东西还不多，没有发现你们有多少创新的东西，不过你们的房子建设还不错，比较漂亮，有点新气派。昨晚看到你们办的《深圳特区报》，也还有点创新的味道。胡耀邦特别指出，特区的机构改革还不彻底，把内地一套搬了进来，还要继续大胆改革。

痛批“白衣秀士”，现场解决电话安装难题

胡耀邦的一席谈话，充分肯定了深圳特区建设几年来取得的成绩。到会的省市领导第一次听到总书记如此明确地正面评价深圳，心头如释重负。

频频插话和有问有答的汇报会，持续到下午。梁湘接着汇报特区建设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特别谈到邮政电信建设滞后是特区的一大难题。梁湘说，目前深圳只有 2000 多门电话，不适应特区发展的需要。外商投诉最多的是装不上电话，现有的电话也经常不通不灵。按邮电部门安排的计划，到 1984 年底前，深圳只能扩容增加到 10000 门电话，而 1983 年深圳兴建竣工 18 层以上的高层商住楼宇就有 60 多幢，许多外资和内资企业的办公写字楼，现在排队等装电话的数量已大大超过邮电部门的计划。

梁湘说，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深圳早就提出了方案，希望批准我们与香港一家电信公司合作，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电信技术设备，加快特区的电信建设。但是邮电部不同意这样做，认为与外商合作对国家的保密工作不安全。后来我们又提出由深圳市向银行贷款进口国外电信设备，他们也没有同意。胡耀邦听到这个情况感到十分意外，面带愠色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批评道：有些部门总是喜欢保护自己落后的东西，它们对本部门陈旧落后的事物，甚至是违法乱纪的事情不去管，卡人家却很有办法。有个材料反映山西省某个地方有一位邮递员，长期私拆他人信件多达 3000 多封，偷别人寄的粮票和钱，被举报了也一直没有处理。

胡耀邦说：深圳提出来的方案，我建你管，为什么不能干？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建成现代化的通信设施，搞好了交给你邮电部来管，你收不收编？《水浒传》里讲各路豪杰投奔梁山的故事，林冲要投奔梁山，王伦不给收编。王伦叫“白衣秀士”，我们的同志不要做“白衣秀士”。粉碎“四人帮”后确实还有些人在混饭吃，确实还有“白衣秀士”。我带着全副武装的队伍投奔你，叫你当军区司令，我只当军分区司令，请你做总指挥，你还不收编，我只好自己“落草为王”，搞自己的“忠义堂”，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了——不是替我行道，这个天是社会主义的天。办特区是全国的事情，不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总是要讲道理的嘛。中国还有许多保护落后的事情，自己不改革，也不许别人改革。胡耀邦转过身对陪同视察的工作人员说，这个事情要立即查一下，问问邮电部为什么不能干，为什么不给收编，是不是有“白衣秀士”？

陪同视察的有关工作人员立即拨通了北京电话，向邮电部领导传达了总书记的批评和意见。邮电部闻过即改，一位副部长很快赶到深圳商讨加快特区电信建设的方案。

胡耀邦批评“白衣秀士”的谈话，触动冲击了习惯以计划经济老观念办事的作风和部门经济条条专政的旧模式。长期以来，国内使用电话是代表单位大小、个人官阶高低的一种待遇象征。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这个观念在职能部门里仍难以改变。胡耀邦干脆果断、雷厉风行，抓住电信建设体制上的要害问题，及时帮助深圳克服困难。此后，

深圳电信建设的发展速度、技术设备的先进水平，以及居民使用电话的普及程度，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从“万元村”的变化谈到“三农”政策

地处罗湖区边沿的渔民村，是深圳特区创办后最先富裕起来的万元村。这里的深刻变化引起了胡耀邦对农村问题的深入思考。在汇报会上，胡耀邦说，特区农民富裕起来后，要引导他们向城市化方向转变，要重视利用农村资金，解决资金出路；要组织农村的专业户、富裕大户，把钱用到开发性的投资建设上来。特区可以考虑设立开发投资联合股份制公司，吸收富裕农户参股，或者组织富裕农户自己兴办联合企业，引导他们投资搞交通、能源建设。

胡耀邦指出，农村的自主权扩大以后，专业户、富裕户会大批涌现。他说，昨天从《南方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说南海县平洲公社富裕户农民在银行的存款达到 3000 多万元，这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他问在座的广东省负责同志：广东全省农村有多少存款？有人回答说，到 1982 年底全省农村储蓄存款总额为 60 亿元。

胡耀邦说，银行储蓄现金太多并不利，不周转就是死钱，对国家对生产都不利。现在有一种“红眼病”，对农村富裕户眼红，得这种病的主要是些官老爷们。我们要注意防止这种“红眼病”，要保护农村的专业户和劳动致富的农民，同时也要引导富裕起来的农民有了钱搞长远建设，发展现代化农村经济。如果不做引导工作，农村社会就容易出现挥霍浪费，甚至出现迷信、赌博、放高利贷等歪风，使农民走向两极分化。我们国家各种经济信息不灵通，“四人帮”在农村推行的极左路线，使我们党的声誉威信受到严重损害，农民怕我们政策多变，翻脸不认账。农村许多干部和农民存有疑虑，对搞开发性的长远投资不放心。河南信阳有个农民卖羊杂碎，三年下来赚了几万元，他老在提心吊胆，睡不好觉，怕被抢劫，更怕哪一天又被打成经济罪犯。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富裕农民找到正确的出路，转变小农观念，减少盲目性，树立现代农村经济意识，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

胡耀邦说：你们广东的 60 多亿存款怎么利用起来，银行要考虑，各级领导也要考虑。我赞成地方可以设立开发投资股份公司，利用这些资金加快交通、能源、电信建设。这种股份公司可以城市和农村联合共同投资，也可以跨县镇地区联合兴办企业。修公路，包括修建高速公路，都可以考虑设立股份公司吸收农民参股投资。

会上，胡耀邦建议有关部门重视研究农村的税收政策问题。一位陪同人员汇报说，1982 年全国农业税收共 36.98 亿元，农民平均年收入为 230 元，税收负担每人年均 5 元。胡耀邦说，从这个数字上看，这是两千多年来对农民最好的“让步政策”，什么“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不可与之相比，我们比汉文帝、汉景帝高明得多。但是现在农民的实际负担并不止国家税收这一项，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身上的额外摊派项目很多，什么民兵费、民办教

师补贴费、计划生育费、军烈属优抚费等等，一共多达 20 多项。摊派到农民头上的这些费用，大大超过国家税收这一项，农民的实际负担并不轻。对这个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有关部门应当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废除那些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制订一个好的税收政策，这样就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就会欢迎拥护我们。

会上，胡耀邦还特别强调特区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他说，特区如果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高楼大厦建得再多再漂亮，也不能说特区搞好了，成功了；特区必须建设成为文明城市，环境美化，人的精神面貌、社会风气、治安秩序、机关作风等都要有全新的气象。他要求深圳办好广播电视、报纸、学校教育，加快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等事业的发展，还要多建公园。他还亲自过问中央电视台节目在深圳收视不清的问题，责成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当询问到 1982 年全市干部职工平均月工资为 113 元时，随即表示应提高一些，并赞成有技术专长的人才可以兼做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

赞赏蛇口人事制度改革，寄望“少年郎”

2 月 9 日上午，胡耀邦兴致勃勃地来到以蛇口速度、蛇口模式而名扬全国的蛇口工业区，受到干部职工的热情欢迎。总书记一行在简朴的会议室里，首先观看了纪录工业区移山填海搞基础设施建设的电视录像，然后听取工业区创办者袁庚的汇报。

袁庚说，1979 年初，经过中央批准，我们在蛇口半岛划出了几平方公里土地，由招商局开发建设工业区。我们从北京、上海、广州罗致了一批冒险者，放弃了大城市户口，来到荒山野岭的蛇口办工业区。几年来，中央批准招商局从应上交国家的利润中留下 10% 的资金，5 年内不上交，大约每年留取 3500 万（港元）做本钱，还允许我们向银行贷款，让我们自己开发建设。到 1982 年底为止，我们共投资折合人民币 8900 万元，完成 1.2 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工程，实施“五通一平”（水、电、通信、道路、煤气、平整土地），打下吸引外商投资的良好条件。目前，工业区已建成 27 万平方米的商住楼宇和厂房，再作若干年的努力，蛇口将建设成为以工业为主、出口为主的综合性小型海港城市。目前已有 42 家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开始投产，产品包括铅材、集装箱、家用电器、服装等。胡耀邦听后满意地鼓励说：你们不仅要办工业，更要大胆搞改革。袁庚回应说：总书记在 1 月 20 日的报告（指胡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改革，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四化建设。对此，我们深有体会。报告的每一条都说到我们心坎上了，从上到下都能这样办，国家就大有希望，特区建设步伐也会大大加快。

袁庚接着说，现在办事情真难，蛇口工业区上头有 5 个婆婆，谁都要管，谁都不全管。蛇口工业区只是全国 96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九牛一毛，希望各方面能网开一面，支持一下。工业区许多事情我们都想改，每迈出一大步都有困难和阻力。从历史上看，改革者大都没有好

下场，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到康梁维新变法，再后来的六君子都失败了。现在有党中央正确路线指引，又有中央领导带头改革，完全相信现在的改革一定能成功，我们这些冒险家也不用担心落得“五马分尸”，因此决心就更大了。目前打算着手彻底改革工业区的领导机构、人事干部任用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工资福利制度等。我们已确定到4月采用职工直接投票选举的办法，产生工业区新的领导班子，让有专业知识、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在工业区管理机构中占优势，平均年龄不超过45岁。新班子组成后每半年进行一次职工信任投票，达不到过半数职工信任票的班子成员，随时改选更换。袁庚说，现在党政干部普遍有一种坏风气，只怕上头的官，不怕下面的群众；想的是自己的乌纱帽，对人民群众的疾苦与呼声漠不关心。要改变这种风气就要改革人事制度，要有群众监督。

袁庚长达半个小时的汇报受到胡耀邦的赞赏。他说：你们的设想和看法都很好，这样改革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转变干部作风。元朝戏剧家关汉卿有一出戏讽刺官僚主义，有四句话很生动，叫做“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朝上堂敲三下，卜（不）通卜（不）通又卜（不）通”，挖苦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什么都不懂，只会作威作福，欺压平民百姓。你们要用搞“五通一平”一样的决心来搞改革。最后，袁庚特意把两位刚从大学毕业被招聘到工业区的青年介绍给总书记，胡耀邦与他们握手，询问了他们的年龄和所学专业，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英雄出自少年郎。你们是少年郎啊，特区是个新舞台，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要靠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努力，你们要有大作为。

胡耀邦的名字铭刻在人民心中

结束了蛇口工业区之行后，胡耀邦离开深圳返回北京。3年后，1986年夏天，胡耀邦陪外国贵宾访问深圳，第二次踏足特区。这时他虽仍是总书记，处境却比3年前更加严峻了。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媒体几乎全被隔绝，现在连历史资料也难以查找，这个空白只好留待他人来填补。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各种矛盾不断产生，人们的思想认识时而前进，时而反复，争论一直持续不断。固守旧体制的势力，常常与极左势力里应外合，抓住改革开放中一些难以避免的消极现象大兴问罪之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国内局势，正处于两难困境的非常时期，面对社会问题成堆，当局者处理问题又处于“左不得，右不得，快不得，慢不得，急不得，拖不得”的状态。身处第一线的胡耀邦，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处于风口浪尖上。

胡耀邦面对某些人横加贬责，视特区为资本主义异类欲加扼杀之时，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最早站出来坚定捍卫深圳经济特区这个新生事物。胡耀邦的深圳之行，实际上为一年后邓小平视察深圳探了路。回忆起20多年前短短三天里的所见所闻，在笔者心目中，胡耀邦不

愧是我党卓越的领导人。他务实求真，坦诚率直，平易近人，不存心计，毫不矫饰；他充满革命激情，记忆力惊人，说话语速快，手势比划动作多，即兴讲话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在他的鲜明个性里，融合着坚定的党性和浓浓的人情味、人性美。

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会包含着一连串的谬误。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不断澄清纠正谬误的历史。重大历史事件一经发生，时间老人就会把它变为“过去式”，后人就会从“过去式”吸取教训，得到启迪。

20 世纪的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胡耀邦在中国政治风云变幻中，率先冲破种种禁锢。他忠实地执行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带领中国人民走过残冬的严寒，迈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迎来生机无限的春天。胡耀邦的名字永远留在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丰碑上，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作者系新华社深圳支社原社长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 年第 8 期）